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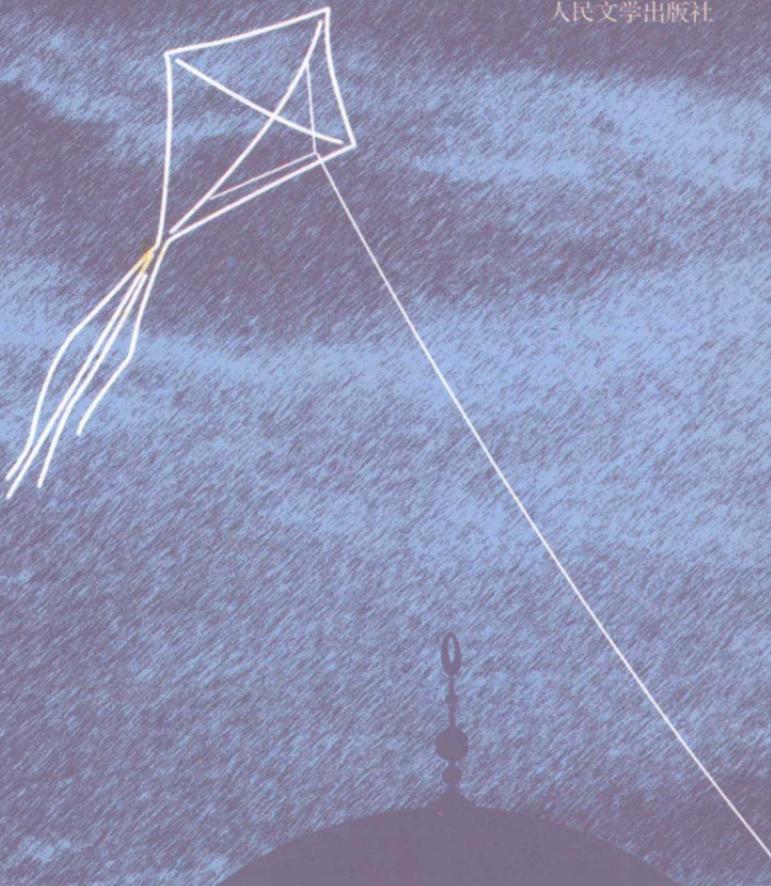
Inaam Kachachi

[伊拉克]

伊娜姆·卡恰齐——著

林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果我忘记你， 巴格达  
*S i j e t ' o u b l i e , B a g d a d*

Inaam Kachachi

[伊拉克]  
伊娜姆·卡恰齐——著  
林盛——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如果我忘记你，**巴格达**  
*Silje t'oubelle, Bagdad*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1-564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我忘记你,巴格达/(伊拉克)伊娜姆·卡恰齐著;林盛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020-4

I . ①如… II . ①伊…②林… III . ①长篇小说-伊拉克-现代 IV . ①I3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2726 号

**Si je t' oublie, Bagdad**

Inaam Kachachi

**Requiem pour un poisson © LIANA LEVI, 2005**

特约策划:何家炜

责任编辑:黄凌霞

装帧设计:董红红

**如果我忘记你,巴格达**

[伊拉克]伊娜姆·卡恰齐 著

林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0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6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9020-4

定价:20.00 元

献给塔拉勒

## —

悲伤要是个男人，我就不会消灭他。相反，我会祝他长命百岁。

这种阴郁的感觉，它是如何征服了我，又直逼刻在我心底的热情？

为什么世间万物在我看来从此都染上了这未曾窥见的色彩？这种新奇的颜色，我说不上它确切的色调；即便只是尝试着描述下特征，各种词汇也会在我脑中纠缠起来。甚至很难通过肉眼分辨出来。

难道我早患上了色盲症？除非事实刚好相反：过去，我看东西十分清楚，而如今，我的视力却在嘲弄我，让色彩变得扭曲……

就连我的笑容都发生了改变。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笑得像要掉了下巴，却毫不顾忌地露出我歪歪斜斜的牙齿。用加尔文的话说，这口牙就像是家受欢迎的咖啡馆，来这儿的常客一吵起来就把椅子扔得满天飞。那时，他还想要挑逗我。但挑逗再也不是适合我的游戏。况且谁会想要对一个胸中怀抱墓地的女人献殷勤呢？

天哪，简直一团糟！我感觉自己顿时成了一面破了口的镜子。笑的时候总是很短暂，很肤浅，毫无乐趣。这微笑很轻很轻，像是没了味道的汽水。而且，我真的笑了吗？或者只是害羞

地不想让自己笑出声来？仿佛是我在故意疏远这些司空见惯的乐趣，还有转瞬即逝的喜悦。我把手挡在嘴前，不让它倾吐多余的言辞，不让它出卖我从巴格达回来后感到的创伤，仿佛用完后拧干的拖把。

### 支离破碎的拖把。

我抛弃了许多小时候的习惯。已经不再把生命看成是一个个未经加工的电影片段。每一段人生都构成了一部电影，每一部都必须找到一个标题，即便，其中最强烈的那些片段掠过我的眼前时，我都无法为它们各自选上一个。

于是，我在屏幕上看来就像是一个被出卖的圣徒，背着装满日常用品的土黄色背包，顶着钢盔，穿着满是灰尘的徒步鞋，跟在挥着胜利旗帜的战败士兵队伍后面。我究竟是在哪里早已目睹过这样的场面？难道不是也在伊拉克，只是换了个时间，换了场人生？战败的军队是否会不屈地重生，只要能回到这片富庶的大地，回到美索不达米亚——这片“两河之间的土地”？

我承认：我回来时伤痕累累，背包里只有一袋沉重的悲伤，和两只“努蜜”，这种伊拉克的甜柠檬是我答应带给母亲的。显然，她比我早很久发现背叛的好处，就是她坐着车来到底特律隆重接受美国国籍的那天。

我递给她这两颗果实的那刻，她的双眼浸满泪花。这两颗橙黄的果子长在摩苏尔大房子的花园里，她在那里度过了整个青春。她用双手抓着它们，接着深深地吸气，嗅着它们的清香，仿佛一口气找回了她父亲的念珠、母亲的乳汁，还有历历往事的气息。

整个背叛的往事凝结在两颗果实之中。

从心底里，我爱它，这刺痛了我的悲伤。当我的灵魂赤裸裸地投入它的洪流，我爱上了它那温柔的卵石。用世间的一切都换不走我肩头的这份重负。这壮丽的悲伤让我相信，我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而是一个生根于他处的女人，我的根在这历史的深处。就像有人手里紧握着一块木炭，它燃烧着与众不同的生命。

二

“达……达……迪杜……迪拉尼……

“去巴什卡，去巴萨尼。

“爸爸村里绕一绕，

“买来干果和干酪。

“谁知巫婆全扫空，

“家有恶棍一老公。”

我的外婆拉玛……

我的外婆拉玛把我拉到面前，拉进她温暖的怀抱。我柔弱的上半身紧贴着她结实可靠的胸膛，突起的白色棉胸衣每次被汗水浸黄时，她都会用沸水和洗衣粉洗净。

我入了迷，眼睛直盯着她两颊微红的清朗面容，紧紧抓着她的肩头。我的腿悬在一边，甚至都没触到我外婆坐着的那张床，双膝交叉，摆出从女性杂志上得来灵感的优雅姿势。

这位妇人会读、会写，还喜欢看报，她算是她那时代中的一个先驱人物了。

她摇晃着我，和我一起向前侧身——尽管我差点昏过去，接着又一起向后摇摆。那时，她就唱着这首歌，和我一遍遍诉说着老旧的故事，其中的寓意会不断浸润我依然柔软的良知。这些故事源自她还住在摩苏尔的那段时间，在河边那栋古老的石头房

子里。这房子属于吉尔吉斯·萨乌尔——“教堂执事”的意思，我的曾外祖父。他的姓氏由来实际上是因为负责塔哈勒教堂的维护，打扫教堂里的圣像和烛台。每周六，他都必须清理支柱上残留的蜡烛，接着再用柠檬片打磨烛台。

我小的时候，有人带我去过那里，那是四月的某一天，在复活节的假期里。城边的田野里开满了春白菊。这大片铺满金黄的原野让我惊叹，自然的香气令我沉醉。石缝间的银莲花仿佛中了魔法，红扑扑的像是我妹妹们刚从浴室出来时的脸颊，水一滴滴从她们丝般的发辫上淌下。我怎么能不爱上摩苏尔？那里的每个人都带着和我外婆一样的口音。

我太爱他们了，我在摩苏尔的亲人们。他们的头发闪闪发光，整齐地梳在脑后；白嫩的面颊上透出一层粉红。他们圣诞节时会来看我们，有时则是来办一些行政手续，或者是来巴格达找名医看病。

他们不安地坐在这些当时很流行的索涅特藤椅的边沿，准备着起身向前接过主人递来的茶，热情地问候刚到的人，或者把他们的位子让给某个年纪更大的老人。他们总是把右手搁在小肚上，而用左手拨着念珠。他们说话的时候，就像是谁家厨房柜子刚压塌了，谁家的门被拆坏了，或者谁家的平底锅和锡制锅盖落到了地上，发出巨大的声响。他们嘴里蹦出来的词，辅音qâf和ghayn都咯吱作响，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而alif这样的元音则张牙舞爪得像是玛瓦勒<sup>①</sup>的尾音：“我的叔叔——”，“我的

---

<sup>①</sup> 阿拉伯音乐中的传统民间歌曲。——法译者注（本书脚注除特别说明外，均为法译者注。）

婶婶——”。他们就像是在演一部关于阿拉伯文学的历史剧，歌颂着赛弗·道莱酋长的丰功伟绩。

如果说我热烈地爱着这群人，我却从来感觉不到和这栋大而潮湿的房子有什么默契。房子的楼梯通向无数个平台，地下室里的酒窖也不计其数。对我细小的腿来说，这些台阶有些高过了头。只靠顶上的小天窗射进来的些许光亮，这房子还远远不足以驱散黑暗。

过了会儿，我又想起这首歌，当时，我们的军队正经过连接摩苏尔与附近村庄的公路。我们路过巴什卡，镇上的年轻姑娘站在屋子前，看到我们时，理了理头上的白纱。我想到或许能拍一部记录她们的影片，题目叫《白鸽与纱巾》。

她们的脸上始终毫无表情。她们不会笑，也不会挥动她们的手帕，我徒然想把她们和有关二战的美国电影联系起来，要不就和巴黎或者那不勒斯的故事扯上关系，那些地方的姑娘会来欢迎美军的车队，在装甲车的后面连蹦带跳，想等到一个英俊的士兵亲吻她经过太阳雕琢的面孔。

我告诉同伴，“巴什卡”可能经过了古老的变形，原来的词义表示“恋人之屋”，而旁边“巴萨尼”小镇的名字应当是指“哀女之屋”。他们很高兴了解到这样的细节，但不安很快又重新占领了他们的内心。我们经过一群长着浓密胡须的男人身前，他们身穿雪白的长衣，裹着同样雪白的头巾，从一片柏树后面突然冒了出来，朝我们的队伍投来了恶意的目光。

我本来想跳下吉普车，对他们说“愿上帝保佑你们！”再和他们聊上几句，比如，向他们打听种小麦的时节，或是问问

附近哪里有店铺能买到浴巾，再或者去他们谁的家里喝上一杯清水。

我还想骄傲地介绍自己，告诉他们我是这里的人，和他们说着同样的乡音，我的外公是尤瑟夫·萨乌尔上校，他曾在四十年代指挥过摩苏尔的征兵所。唉，可惜不行，和他们说话等于是拿我和我同伴的生命去冒险。指令很清楚：我该保持沉默。我因而第一次痛恨起我的这身制服，它将我和他们隔开，仿佛我们身处两个不同的战壕。不过，事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是啊，我想了想，我就正在一个战壕里，而他们在另一个里。不过，我像个优秀的演员，能够同时扮演他们的女儿和他们的敌人，同时把他们看作父母和对手。

从那天起，我甘于活在这样的想法里，我患上了这种叫做悲伤的病，并且安于如此，不求救治。

况且，要我如何克服这病痛？

它让我重生，

它给我安慰，

它使我长大，

它令我成熟，

又不断教会我，在价值方面，

人们能想象到的最美的涵义。

### 三

“一年九万七千美元——包住、包吃、包漂白。”这句话在人们心中激起骚动，引来众人侧目。它在这些底特律的伊拉克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中奔走，仿佛椰枣树枝压到了花园里还覆盖着的那层白雪之上。

萨伊拉来看我，扔下这行数字，扔下这如焦木般熊熊燃烧的一句话，旋即又如龙卷风般离去，甚至都没停下来喝杯咖啡。我听到她那辆老旧的丰田汽车轮胎发出嘎吱嘎吱的打磨声，而她则兴冲冲赶去把这好消息告诉其他的朋友和亲人。

这句话太珍贵了，珍贵到不该只用移动电话轻易告诉别人。这就好像乐透彩，不是每个人都会赢，有机会的只是像我和萨伊拉这样的人，既有稀罕的美国国籍，又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我问她，要留下两个孩子，只身离开，她怎么打算，而她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我的孩子？他们开心地睡不着觉，要我尽快答应下来，免得机会从我手指间溜走，还便宜了别人。”

九万七千美元，这确实绰绰有余，足够让孩子们愿意打发自己的父母上前线；况且这还只是个基数，还要加上百分之三十五的危险补助，及同比例的开销花费，还没算上时不时会有的樱桃蛋糕。把这些都算上，就不知不觉有了十八万六千美元。这个数字足够高到劝服一个“七里地”的穷叫花子告别自己的街区，踏

上不归路；足够高到支付一栋南田市乡村别墅的预付金，或是买一辆崭新的轿车。这也绰绰有余，足够送我的弟弟雅善——他的名字在美国这里变成了詹森——去戒毒中心，今后还能送他进大学。

照这样的状况，过一两年，一切都将恢复如常。我也能洗洗我母亲的肺，这肺里尽是廉价烟草留下的污秽，她整夜一边大口吸着烟，一边流着泪。隔在我们卧室之间的木制屏风没能阻止她的抽泣声传入我的耳中。有时，她没有哭出声来，就像一台坏了的电视机；我常常令她布满泪痕的脸感到惊讶。于是，我明白，女人并不只在被抛弃时哭泣，也有时，她们只是感到了哭泣的欲望带来的痛苦。金钱是一种幸福的形式，而有了这笔钱，我就把幸福带给了我的母亲……绝不能让这次机会溜走！

萨伊拉来之后过了几天，负责为国防部招募的公司四处发布广告，在移民聚集的城市里，在当地电视台上，在互联网上，在底特律和芝加哥教堂举行的周日弥撒的出口处，甚至在迪尔本的什叶派清真寺里。

一根魔棒倏地一下引发了一连串山崩地裂式的响动：哄抬价格、强占位置、散布流言、欺瞒诈骗。有些持赞同想法的人举双手鼓掌——当然该试上一试！另一些人却捏了捏鼻子，唾弃着扭过头去——离开即是背叛，背叛了国家，背叛了灌溉这国家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即便这是为了我们新祖国的利益，这新的祖国日夜用可口可乐哺育着我们。

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随处能听到战鼓声隆隆——在报纸的头条里，在国会议员的演说中。我们看见战争炫目的闪光，它在两

院入口上方飞扬的国旗上闪耀，在越过领空的飞机上闪耀，在将海员集合后送向骚动大海的船艇上闪耀。

于是，在一个寻常的日子里，我结束了没完没了的劳累家务，安坐下来，拨通了某部门的电话，他们正在招聘阿拉伯语译员。我按照规定寄去了他们要求的信息。我不惧怕战争，不怕牺牲，不怕伤残——我重复着福克斯新闻锻造的套话：身负事关国家利益的使命。我是一名战士，渴望帮助它的政府、它的同胞、它的军队，我们美国的军队，去那里推翻萨达姆，解放尝尽苦涩的人民。

片刻后，我在沃尔玛商场前的大广场停下了车，但却没有下来。我留在车里，一动不动，注视着大片大片落在挡风玻璃上的白雪。

再也不用操心新衬衫或是新靴子，从此我将穿上一套全新的制服。我把手臂靠在方向盘上，看见一个身着战服的女兵从广场上经过，步伐坚定，朝着荣耀前进。这荣耀离她只有一两个梦那么远，就在那里，在那个看着我出生的国家里。

可怜的伊拉克人，他们再也不会回去，他们的双眼将会看见自由！老人们将浸润青春之泉，呷饮民主的乳汁，每个人都能品尝生命的味道，一如我在这里体味到的一样。

这些想法在我的脑中闪烁，并在我汽车的驾驶室里辐射出一束强烈的光线，并在十八万六千美金的投射下变得愈发炫目——这是给我能说这种稀有语言的才能的价格，但更像是给我血脉的价格。

而那些民族主义的情感呢？都在里面了？这样的废话从来

对我毫无意义，不管是我在伊拉克的童年时代，还是我在美国的少年时代。“九一一”发生的事带来了巨大的刺激，颤动了我认识的每一个人——父母、朋友还有邻居。我们变成了神经脆弱的生物，发出愤怒却又恐惧的嘶吼。我们用手抵住额头或是捂住嘴巴：“噢！天啊！……噢！天啊！”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仿佛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语言，仿佛我们所有的词汇里只剩下这三个字。

和每个早晨一样，我在睡我隔壁屋的母亲的咳嗽声中醒来。通常我都像个编了程的机器人：首先来到厨房给电水壶加上水，接着便开始习惯性的行程：先在客厅整理报纸和掉在地上的靠垫，接着去雅善的房间叫他起床，重新回到厨房给他准备带去学校的便当；随后我双手抱着我的咖啡杯，小憩一会儿，坐下看看电视新闻。左右这些举动，我都是在半梦半醒间完成的；甚至都不经过大脑思考，双手便忙碌了起来。

不过那天从床上起来，我却径直坐到了电视机前，再没离开过。我呆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遥控器。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改变了早晨的习惯，难道有人前天晚上修改了机器人的程序？

我看见一架飞机撞入了一座大楼。在屏幕的一角，旁边的一座大楼也正摇摇欲坠。

我愣在原地，无力坐下。这两座高楼我很熟悉，我早就去过纽约。显然，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纽约，即便有些从来没有去过，但我不同，我曾到过这座城市，曾停下来凝视它的这对双子大楼，还曾在其中一座大楼前的广场上吃过一块蛋糕。就在那里，看到吗，一个伊朗人推着篷车在世贸中心脚下卖着沙威玛三

明治。

我有些痉挛，无法眨眼，甚至无法呼吸。我什么都再听不进去，手指在遥控器上漫无目的地游走着。我调高了音量，想知道这是不是电影或是特效。但很快我的眼睛落到了屏幕下方滚动条上的“突发新闻”。

我看到整个美国正在我面前熊熊燃烧，我闻到了烧焦的气味。这部电影只能叫做《地狱大楼》，只不过这既非虚构亦非改编，而是现实。

事件发生后一周，联邦调查局公告寻找阿拉伯语的译员，公布了发送报名信息的电子邮箱地址。

看到通告后，我又有了一种热切与失望交织的感觉。我能在如此的抑郁中为我的国家带去什么？像我这样一个穷困潦倒的移民能用什么方式帮助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

看过火光冲天的大楼影像，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继续怀抱微小的理想，伴随着阵咳的母亲还有不省人事的弟弟，这样苟活下去。

迅速地，我没给自己任何时间思考，我也确定这样的思考不会带来任何改变，我登上了公布的网站，在线填写了申请。这并非头脑发热的冲动之举，我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周之后，我接到了华盛顿打来的电话，让我前去接受测试。

只有一点我敢确定：在所有受测人中，我的阿拉伯语水平是最好的，我完全掌握这门语言，这语言的病毒是有着亚述人血统的父亲传染给我的。他从来不给我买适合我年龄的玩具，因为我

最爱和他玩的是“韵脚猫”。

他给我一句诗，结尾是字母noun，我要给出另一句诗，以这个字母为开头。我回答不出的时候，就即兴自己发明一句，于是他便伸出手拉拉我的耳朵，说：“弄虚作假不是我们的传统……但女诗人倒是可以有一些别人没有的特权。”

除了加尔文，我常读的大多是阿拉伯人作品。

“朋友啊，”我对他说，“在我们的群体中，你是唯一能代表美国团体的。”

他很喜欢我这么逗弄他，而且，我说的任何东西他都很喜欢。神圣的加尔文——我叫他“我的加尔文”——我温柔的伙伴，酒鬼，一年里差不多每个月都在失业。每次我一开始和朋友热烈讨论，他就会跳出来，觉得我们是在争吵。

“别担心，亲爱的……我们只是在讨论政治。”

“啊，政治，总是政治！”

在家里，我从来没听母亲说过伊拉克语以外的语言，虽然父亲很想教我们亚述语，他的母语。而英语对我而言，只有上街、工作、看电视新闻的时候有用，这是一门一旦跨出大门口才有用的语言，使用前还要先按规定扭曲下颌。我们的汽车带着我们——我们和我们的英语——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等到这趟行程完结，它又带我们回到屋前，回到波形铁皮挡雨棚保护下的停车场。在那里，我们又背上我们的另一种语言，回到家中。

“你们的女儿怎么没忘记你们国家的语言？”

这个问题，邻居们听到我和萨伊拉打电话时，经常会问我母